

「常態」和「異態」間的巧合、緊張與暴力

趙彥寧

從田野調查先驅者英國人類學家馬凌諾斯基(Malinowski)始，對報導人日常生活慣習抱有「異常」興趣的田野工作者，便常為其田野所在的地主國懷疑身兼間諜任務；而馬氏之所以在日後相關學界享有大名的南太平洋初布連島(Trobriand Island)待上四年，並發表經典民族誌《南海舩人》，乃因時逢一戰，此島的主權國德國懷疑他是英國特務，故而被追不得出境。在另一方面，對邊緣社群之權益持有研究熱誠的田野工作者，也時而為其母國懷疑擁有顛覆政府的企圖；有名的例子是寫作《貧窮文化》的美國人類學家劉易士(Oscar Lewis)，他在麥卡錫時代被列入CIA的黑名單，並長期受到監視。

儘管冷戰表面上已然結束，兩岸亦已開放滿二十年，但是在中台兩地越形熾烈的對峙氛圍下，顯然從事中國婚姻和無證移民的研究並非政治正確的選擇。因為前述兩種情境均曾發生在我們這個研究團隊身上。

我和兩位助理在永樂做田野期間，曾經由於隨手照下閩北臨海各縣隨處可見之「在此偷渡，死路一條」的紅色噴漆標語，為十多位邊防武警留置盤查。反覆檢查我們的數位相機和DV攝影機的存檔時，武警們的懷疑益增：永樂是這麼一個貧困無趣的小島，何以需要攝下如此多照片？為什麼我們光照些雞啊、鴨啊、漁網啊這些「沒有觀光價值」的事物，卻連一張手舉V字的微笑合照也沒有？工作認真的武警們有如解構學派的文本分析研究者，將這些照片反覆放大、倒置、並排，以試圖解讀其後隱含的意義，最後終告放棄。請示上級後，小隊長要求我們刪除那張偷渡標語照，才將我們釋放。

既然我在論文中聲稱無證出境乃永樂常民與國境管理者共享的常識，何以拍攝「偷渡必死」的標語會造成這麼大的風波？因為重點並非偷渡，而在於永樂同時也是中國飛彈試射台灣的基地。我認為這個事實凸顯了永樂人在兩岸國家主權運作下的荒謬命運——又或許，這個命運並不局限於永樂人，而是廣義之國境邊區社會的荒謬性寓言劇？

或許這個故事會讓讀者產生「中國真可怕」或「在中國做研究好危險」的結論，但是在我的研究經驗中，國家加諸自身公民之規訓和處罰的實際作用有時更大。上述的永樂行返台後次日赴台中授課時，我在台北的住處遭竊，失竊物包括儲有數年來田野筆記的舊型手提電

腦、備份磁碟、DV 攝影機和已錄 DV 帶（「竊賊」非常「體貼」地留下了原本和已錄帶共置於旅行箱中的未錄空白帶）。由於赴永樂的研究必須向陸委會申請小三通專案，此會某調查局出身的處長詳知我的研究主旨，非常湊巧地，兩天後他打電話給我，表示希望我與國安局「某特定人物」會面，以「協助政府打擊人蛇集團」。

既然我在論文中表示台灣檢調單位自 1990 年代起即已掌握永樂人蛇集團的名冊，那麼又為何需要我的協助？這是直到今日我都不能理解的「國家權力之謎」。我只知道過了不久，論文中提到的「大園仔」一詞突然充斥於台灣媒體，之後總統便裁示國安會以「清剿大園仔」為目標，並成立「靖海」等等跨部會專案。或許我可能提供的「協助」與國境管理之效力無關，而是能夠凸顯此論文結論處所謂之國境管理者可公開誇示的績效？

我是做同志研究出身的人類學者，過去十年又進行了 1950 年代國府政權下生產的公共產物、「第一代外省人」的流亡經驗、「大陸配偶」，以及這篇論文所述的中國無證移民研究。貫穿這些主題的是我對國家權力的研究興趣，而之所以選擇非主流／邊緣人群為研究對象，乃因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總是無所預期地經由這些人士感知正統社會的視野，故而產生了對於「國家」、「權力」、「規範」、「社會」等等社會科學古典概念的意外理解。使用田野調查這個研究方法的原因，不僅在於這是我作為人類學者的基本訓練，更因為進行期間必然不斷發生意外、巧合、不確定性、主客間的緊張關係、或甚至赤裸的暴力，譬如前述的邊防武警扣留和田野資料被竊事件。我以為這些超溢「可想像之日常生活型態」的事件，正揭露了現代社會生活同時介於「常態」和「異態」間的動態性本質。

但是在台灣社會科學界日趨專業化（SSCI/TSSCI 的評鑑點數制度、「正確」且「符合邏輯」的寫作和論證方式，等等）的狀況下，是否社會科學界的從業人員也逐漸不由自主地選擇「政治正確」或具有「學術市場價值」的研究主題和論證方式呢？畢竟為了取得終身職，劉易士也不得不發表一本堆積既存文獻而論點毫無新意的大堆頭著作。

寫作這篇「幕後告白」的心情很矛盾。我擔心流為自戀式的告白，或令讀者產生「做弱勢族群研究真英勇」的誤解。所以我最後想說的是：邊緣社群的研究者毫無英勇可言，因為我們的研究對象根本沒有能力、時間或興趣反駁我們的說法。在移民社會學和多元文化議題日受重視的此刻，我認為這也是研究者無法不嚴肅面對的倫理問題。